

天下蓝西

高阳云树◎著

『鉴于往事，资于治道』，追随司马光的视线，探求历史的真相。

融汇史实与评议，展示古人成败得失，使今人感悟做人做事道理。



知識出版社

天下蓝图

高阳云树◎著

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下蓝图/嵩阳云树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015 - 6113 - 1

I. ①天… II. ①嵩… III. ①人生哲学—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IV. ①B82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5211 号

选题策划 杨 静 方模启
责任编辑 之 时 冯妙华
责任印制 张新民
封面设计 刘红刚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 88390717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厂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印 张 19.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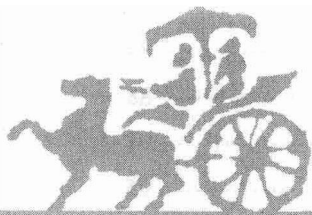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15 - 6113 - 1 定价: 32.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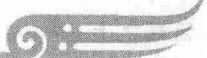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中华书局
北京
100071



天

下

蓝

图

- 周威烈王的破落——司马光评周天子命韩、赵、魏为诸侯 1
- 小人也卓越——司马光论智伯之亡 5
- 藏富于民——司马光评子思、孟子言义利 8
- 败也客卿——司马光评范雎谲穰侯 12
- 儒将蒙恬——司马光评蒙恬之死 16
- 择主而侍的时机——司马光论刘邦斩丁公 19
- 林下张良——司马光评点张良 23
- 大师风范——司马光评叔孙通制定朝仪 27
- 萧何的鬼心思——司马光评萧何治未央宫 31
- 贯高非义士——司马光评贯高之狠 35
- 影子皇帝——司马光评惠帝纵情酒色不听政 39
- 蛊惑的样板——司马光评叔孙通教唆惠帝文过饰非 42
- 戴孝吊活人——司马光评汉文帝逼杀薄昭 45
- 裙带飘飘——司马光评汉武帝起用外戚李广利 48
- 迟来的爱——司马光评汉武帝用赵过 52
- 人品江山——司马光评汉武帝托孤 55
- 功臣子弟——司马光评霍氏之败 58
- 王霸四观——司马光评汉宣帝骂儿子 63
- 好人也是“坏人”——司马光评贡禹谏汉元帝节俭 66
- 元帝败家——司马光评汉元帝信谗杀萧望之 69
- 官场众生——司马光评贾捐之、诸葛丰诸人 74
- 去留之间——司马光评京房面君言治 77
- 东汉立国——司马光评刘秀起用卓茂为太傅 80

- 攻心兵法——司马光评光武帝亲授冯异平定关中之策 84
- 韩歆逆鳞——司马光论刘秀逼杀韩歆 88
- 发酵的权力——司马光评汉章帝明知窦宪欺罔却不治罪 91
- 云端之上——司马光评樊英应朝廷征召 95
- 怪胎梁冀——司马光评汉顺帝以梁冀为大将军 99
- 人淡如菊——司马光评党锢之祸 103
- 皇帝也卖官——司马光评东汉“三互法” 108
- 有一种“情感”——司马光评士孙瑞有功不伐 112
- 名士做派——司马光论荀彧之死 117
- 东汉二百年——司马光论曹操畏名义不敢篡位 122
- 成败分封——司马光论曹丕羞辱于禁 126
- 世有乱人而无乱法——司马光评刘劭作考课法 129
- 皇帝的犹豫——司马光评晋武帝刑赏不公 133
- 竹林下的突围——司马光评嵇绍仕晋而王裒不仕 137
- 形式与垃圾——司马光评杜预主张服心丧 141
- 西晋时气——司马光评何曾其人 143
- 东晋初年——司马光评王导宽宥庾亮、卞敦之罪 147
- 立身之孝——司马光评沈劲为子之道 153
- 风云之借——司马光评王猛急于杀死慕容垂 156
- 驴肝肺的条件——司马光评苻坚宽释慕容评 160
- 王朝的底限——司马光评苻坚赦免造反的苻洛 164
- 青山不在——司马光评苻坚之败 167
- 刘裕的眼神——司马光评刘裕屠广固以快忿心 171
- 猛兽与群狐——司马光评刘裕命沈田子戒备王镇恶 175
- 老庄的变异——司马光评崔浩不信佛老而信道教 178
- 政治人的学养——司马光评刘宋立四学 182
- 贪人败类——司马光评刘义康、刘湛事件 185
- 泽及四远——司马光评北魏孝文帝赦免罪人 190
- 远方的朋友——司马光评齐竟陵王萧子良忧死 193

南朝士林——司马光评谢朓兄弟不预人事·····	196
皇帝和石子——司马光评北魏孝文帝选人先门第后贤才·····	199
无精神的官场——司马光评梁武帝任免萧宏·····	202
孔门心法——司马光评湛僧智有功不居功·····	205
遗恨说“腊鹅”——司马光评昭明太子忧死·····	207
菩萨皇帝——司马光评梁武帝延诘贺琛·····	211
极品马屁——司马光评陈文帝以孔奂为遗直·····	215
科学地杀人——司马光评北周武帝处置高遵失当·····	219
花好月圆时——司马光评北周武帝善于处胜·····	222
真假兄弟——司马光评隋文帝遣诸子分据大镇·····	225
天若有情——司马光评玄武门之变·····	228
与时消息——司马光评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	232
琴话——司马光评唐太宗论乐·····	235
宿命的邂逅——司马光评唐太宗立李治为太子·····	240
水陆珍馐——司马光评唐玄宗提倡节俭·····	243
始皇无官运——司马光评唐玄宗、姚崇迷信符命之说·····	246
伴食宰相——司马光评卢怀慎为相·····	249
出将入相——司马光评唐玄宗置太公庙·····	252
仿佛照颜色——司马光评唐玄宗耽溺声玩启盗心·····	255
玩寇的起因——司马光评唐肃宗对投降安史之官员按六等定罪·····	258
有唐分水岭——司马光评唐朝节度使由军士废立·····	262
唯饭史观——司马光评常袞辞禄·····	266
大道至简——司马光评崔祐甫答唐德宗用人之问·····	270
战争后遗症——司马光评李泌为唐德宗理私财·····	273
绥靖祸遗四百年——司马光评牛僧孺姑息杨志诚之议·····	277
所谓太平——司马光评牛僧孺诬称“小康”·····	280
认识论问题——司马光评唐文宗感叹去朋党之难·····	283
理想国——司马光评高从诲、孙光宪、梁震·····	287

五代的局器——司马光评后晋高祖赦免李彦珣	290
风流不是君王派——司马光评南唐烈主弃民以资敌国	293
乱世流氓——司马光评后汉高祖失仁、信、刑	296
五代的买办习气——司马光评冯道	299
揽辔澄清——司马光比较后唐庄宗、后周世宗优劣	305

周威烈王的破落

——司马光评周天子命韩、赵、魏为诸侯

《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为何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开篇，而不选其他时间，比如《史记·六国年表》的始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6年），或者直接上继《春秋》？

因为这一年，在司马光看来，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在这一年，威烈王姬午任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一承认不打紧，使原本属于打家劫舍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由此写了一篇长达一千二百多字的评论，认为周天子此举是周室益发破落的关键。周室直接控制的地盘很小，而之所以能成为天下的宗主，大家都服从周天子的指挥，是因为他有“天子”的名分。谁人胆敢冒犯，轻视天子权威，有势力的诸侯则可以联合其他诸侯国，灭了违礼犯分者。当时诸侯就怕这个。春秋五霸所做的也便是这项工作，美其名曰“奉天子以令不臣”。

而姬午把立国的底限给出卖了，“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现在即使再有齐桓公一流的人物，想出面收拾魏强盗、赵强盗、韩强盗，也师出无名了。因此，毛泽东说：“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

何谓“礼”？周作人先生讲：“生活之艺术这个名词，用中国固有的字来说便是‘礼’。‘礼’是使生活变得和乐而美妙的一部分，这样理解真好。司马光长篇大论辨析“名分”一说，我想也是为了使生活变得彬彬有礼。然其实，也就是夫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国君要像国君，臣下要像臣下，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这里面内含无可推卸的职责与如寒来暑往般必不可少的秩序，并一定是说君父便高高在上，等级森严。不君不臣不父不子，其结果只能是人亡政息。我想，没有人愿意这样。当年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就用这八个字回答。齐景公深有感触地说：“对呀，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即使粮食再多，我能吃到吗？”（《论语·颜渊》）

周威烈王显然就不像人君，做事基本不着谱。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东周接下来的形势就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天子完全褪为空壳。

宋神宗读出了司马光的这层用意，他在为《资治通鉴》作序时说：“（司马）光之志，以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造端立意之所由也。”而胡三省更直接：“此温公书法所由始也。”对司马光的这个开篇法门，评价甚高，总括为“温公书法”。

据我所知，史笔称“法”的共有三家，另两家一是“春秋笔法”，一是朱熹的“紫阳书法”。“温公书法”的大要，意在告诫天子，不可自坏规矩，否则上梁不正，下梁必歪。公元前377年，子思在卫国，看到卫侯满脑浆糊，胡乱出主意，而群臣却“和者如出一口”，子思就开骂：“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

而近人之关注“礼”，我认为过偏地看到了“繁文缛节”，却没有看到“斑马线”，于是就乱骂一通，尤以鲁迅为代表，说礼教吃人。其实“礼”之大用在于秩序，《礼记·乐记》说“礼者天地之序也”。打个比方，交通而无秩序，成不成？人生在世，从古至今，有些东西是可变的，有些东西是不可变的。可变的是形式，不可变的是内在的规律。儒家说守孝三年，现在已不合时宜，可变。然孝道之心可变乎？

附：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

天下蓝图

——读《资治通鉴》之“臣光曰”

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乎惧而不敢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害糜灭几尽，岂不哀哉。（《通鉴》卷一）

小人也卓越

——司马光论智伯之亡

三家分晋之前的晋国，政权掌控在六大家族手中，称六卿——智氏、赵氏、魏氏、韩氏、中行氏和范氏。六家以智伯为首，晋室基本上靠边站。晋出公十七年（公元前454年），智伯与赵、魏联手灭了范氏、中行氏，平分其地。晋出公大怒，邀来国际同盟军——齐、鲁，准备与四卿火拼。结果被四卿驱逐出境，晋出公死在奔齐的路上。智伯立姬骄为晋君，即哀公。

这回智伯越发牛气了，上至晋哀公，下至朝中大臣，没一个在他眼里。只要他看中的东西，胆敢不给，一个字：灭！智伯先后向魏桓子^①、韩康子^②要了土地，又看中了赵襄子^③的一块地皮。吃了豹子胆的赵襄子竟然不同意。智伯大怒，胁裹韩、魏，围攻赵氏家族的老巢晋阳（今山西太原），引汾水灌城。城中“沈灶产蛙”，悬釜而炊，然而大家都感念赵家的好，“民无叛意”。

智伯在魏桓子、韩康子的陪同下，视察前线，说了一句让魏桓子、韩康子皆感寒心，进而引火烧身的话。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用肘碰了碰康子，康子用脚踢了踢桓子，因为汾水照样可以灌安邑（今山西夏县，魏国老巢），而绛水可以灌平阳（今山西临汾，韩国祖居地）。恰在此时，赵襄子派人乘夜出城，以唇亡齿寒的道理策反魏、韩。公元前453年，三家遂灭智氏。



司马光承认智伯有才，但智伯之亡，恰恰是因为他太有才的缘故。司马光将人分为四种：圣人、愚人、君子、小人。

什么是圣人、愚人、君子与小人呢？各家有各家的看法，司马光给出了政治学上的定义，“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有品位的人，其才足以促成善良。而高才低品之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其才恰为他的为非作歹“虎而翼”，兴大风作大浪，比谁都厉害。智伯就是这样一个人。

当初智宣子要立嗣智伯，族人智果坚决反对，提议不如立宵（智宣子庶子）。宵表面上看起来凶巴巴的，其实是好人。而瑶（智伯）不露声色，却狠在心里面。心狠败国，“若果立瑶也，智宗族必灭”，智宣子不听。智果翻脸，与智氏划清界限，“别族于太史为辅氏”，不沾这个光。后来智氏全族被诛，辅氏躲过一劫。

司马光此论意在告诫领导者，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愚人顶多办事不力，小人则力足以亡家灭国。慈禧太后就曾当着袁世凯的面，说过同样的话。可是清末那个乱局，也只有袁大头能够收拾得了，或者说他羽翼已成，最终是连江山都收拾到他的屁股底下去了。所以唐朝的李勣，临终前交代后事，警告弟弟，如果发现子弟中有品行不良者，先拉出去杖毙再说，免得遗祸全族。

不幸的是，北宋王安石主持革新，所倚重的吕惠卿，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司马光告诫过王安石，吕惠卿“儉巧，非佳士”，且心术不正，劝王安石慎用。司马光说：“夫忠信之士，于介甫（王安石字）当路之时，或齟齬可憎，及失势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士，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有卖介甫以自售者，介甫将何择焉？”可是王安石没听进去，并以吕惠卿为谋主，凡事都与他商量，对他言听计从。没想到后来，对王安石打击排挤最用力的，恰恰就是之前引为腹心的吕惠卿。

因为有此一节，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及张须《通鉴学》，均认为司马光此论是针对新法诸人而发。然事实不是如此。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正月，司马光向宋英宗进呈《通志》八卷，相当于《资治通鉴》的前八卷。“臣光曰”第二篇即载《通鉴》卷一。而新法诸人是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参政变法时，才开始崭露头角的。比如吕惠

卿，是王安石于熙宁二年九月才向神宗荐任“崇政殿说书”一职的，与司马光写此论，前后有三年时间差。

注：

- ① 魏桓子，名魏驹，是魏国第一任国君魏斯的父亲。
- ② 韩康子，名韩虎，是韩国第一任国君韩虔的祖父。
- ③ 赵襄子，名赵无恤，是赵国第一任国君赵籍的叔祖。

附：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通鉴》卷一）



藏富于民

——司马光评子思、孟子言义利

《通鉴》说孟子的老师是子思，《史记·孟荀列传》载，“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也就是说，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这且不去管他。

周显王三十三年（公元前336年），孟子去见魏惠王，于是有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的典故。南宋陈普据此写了一首诗：“道气凄凉七百年，招贤一举独非天。当场礼义难分别，回首空山重惘然。”孟子纵然聪智，对普遍信奉诈力的社会风气，也是无奈何。然孟子这句话（或者说儒家的义利辨）影响所及，应该说有些死读书的书生把书读死，变得很腐儒，一点不通世务。进而口不言钱，称钱为“阿堵物”，仿佛一旦言钱，便玷污了他的冰雪情怀似的，这也是不可取的极端。

魏惠王一见风尘仆仆的孟子，当头直呼“老头”，很是不客气。接着说：“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言外之意，你若是带着亿万身家来我魏国投资，那么我们欢迎，且把你当婆婆供着。外商嘛，要招待有招待，要优惠有优惠。若你的强项只是一根烂舌头，那对不起了，只能把你当轮子——滚吧。

孟子并不因为魏惠王的无礼而扭头就走，而是以他的辩才，教训了魏惠王一下。他说：“大王何必张口闭口就要利益呢，有仁义就足够了。如果君王只顾为国库谋利，士大夫只顾为家族谋利，士民只顾为自己谋利，

上下起劲地追名逐利，那么这个国家不就危险了吗？只有仁爱的人才不会抛弃亲人，忠义的人才不会背叛国君。”

魏惠王对这个无懈可击的事理，也只得点头称“善”。但他听进去了吗？商鞅一度在他的手下，是很能捞“利”的一个人，可是最终跑到秦国去了。由此可知孟子的命运。

《通鉴》卷二同时记载了孟子和子思的对话。孟子请教子思，牧民之道何先。子思说：“先利之。”孟子当即表示反对：“君子所以教民，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说：“讲仁义，就是为了让百姓得到利益。领导不仁，胡作非为，则百姓必然流离失所；领导不义，狐媚阴谋，则百姓也必然学样而尔虞我诈。这是大不利。所以《易》曰：‘利者，义之和也。’^①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②这才是利之大者。”

司马光评论了这两则故事，虽只寥寥几十个字，可是他的义利观全在里面了。

司马光认为，子思和孟子的话，思想内核是一致的，只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已。孟子见魏惠王（魏国首都大梁，所以“臣光曰”又称梁王，《孟子》一书称为梁惠王），此子估计很不怎么样。司马光说：“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利，不仁者不知也。”算是没点名地批评他“不仁”。而他的儿子魏襄王，更不怎的，孟子给他的评价是“望之不似人君”。所以孟子对魏惠王只能言义，不能言利，否则被他抓了话头去，连你孟夫子都昌言利益了，他将更“利”得肆无忌惮。

而子思与孟子之间的对话，无疑是高端访问，都是聪明人，说话也就不必弯弯绕。从子思的话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孟子在“谁行义”与“谁得利”这个问题上，还没有搞清楚，于是子思点拨了他一下。所谓“利”，就是说要让大伙得到实实在在的利好，这是所有国家政策的中心。而在上者行仁义，不乱来，百姓才会有好日子过。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

由此可见，子思是典型的“藏富于民”的思想，司马光继承了这一思想。也就是说，“藏富于民”是儒家思想在经济上的最重要主张。管仲讲“衣食足知荣辱，仓廩足知礼仪”。他是主张富民的，孔子在《论语》中多次表扬了管仲，可见子思传承了他爷爷孔子的思想。

纵观司马光的一生，他也在极力践行这个思想。他与王安石从好朋友变成对头，起因就是对“利”的不同理解。司马光死命反对王安石变法，反对最力的就是“青苗法”。

“青苗法”有点类似现在的银行信贷，或者更像小额贷款。政府给农民提供紧缺的生产资金，待收成的时候连本带利归还。王安石规定的利息是二成，这从当下的民间信贷来看，也算是蛮高的。可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往往达到四成的高利率。神宗要求“青苗法”遵循自愿的原则，不得摊派。但地方官为了政绩，为了完成任务，大多走摊派的路子。因此，高额的利息，往往弄得农户倾家荡产。

司马光非常反感王安石的敛财之举，把王安石以及条例司（王安石主持变法的机构）诸人比作汉武帝时期的桑羊弘。司马光认为天下财货就那么多，王安石的“开源”方法无疑是在盘剥百姓。因此，他提出“节流”，政府应缩减一切不必要的开支，该省的就得省，从皇帝做起。但这个方案没有获得通过，于是司马光毅然离开朝廷，闲居洛阳，一心编写《通鉴》。

王安石“三不足畏”的精神，很见胆气，显见其变法到底的决心。但效果很糟，后人才将靖康之变的罪过溯源到他的头上。直到清末，王安石的路子才得到支持。但我本人并不认可王安石的做法。单就“青苗法”来说，初衷很好，但结果更像高利贷商人的行为，所以不得人心。

司马光开初也支持变法，只是变法的路数不同罢了。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他给王安石的信中说：“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尽其职，委任而责成功，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此即司马光经济的理想，他要藏富于民，而王安石却是要将天下财力收归到政府手中。他们的最大分歧便在这里。

自然，司马光也不是腐儒，他也谈利，而且谈得很具体。司马温公晚年为相，经常过问官员的生活质量，工资拿来够不够开销（每询士大夫私计足否）。人怪而问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为朝廷而轻去就耶？”做官做到饭都吃不饱，他会为国效力吗？“轻去就”这里应该理解为敢坚持原则而不惜丢官弃职。

而司马光本人对钱财却相当不看中。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宋仁宗驾崩，遗命赐群臣金珠，值百余万钱。司马光与同列上疏切谏，朝廷不